

· 热点透视 ·

以政治和经济优势应对中非关系的新形势和新挑战^{*}

程 涛

内容提要 上个世纪，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非洲真诚的帮助，有力支持非洲国家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奠定了中非友好关系的牢固基础。当今，中非关系的内涵和形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非洲对中国的重要性没有改变，中非互有需求。当前，中国对非工作面临新机遇、新问题和新挑战，必须有新思维和新举措。中国和非洲的领导人要做到“长相知，不相疑”；必须妥善应对非洲民主化、多党制带来的挑战，处理好同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工会的关系；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利益交汇或利益冲突增多，在对非援助、投资、贸易等方面，我们要进行理念的转变、方式的更新、结构的调整；要积极化解国内在中非合作中的一些消极因素；要认真应对中非关系中西方大国的消极因素；进一步发挥中国的政治优势，充实和增加中非关系的政治内涵，努力打造中非外交合作的新领域和新亮点。

关键词 中非关系 中非合作论坛 新形势 新问题 新思维

作者简介 程涛，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理事兼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中国驻马里和驻摩洛哥大使、外交部非洲司司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北京 100190）。

* 本文系作者于2012年7月12日在外交部“蓝厅论坛”上的发言，发表时做了部分修改。

中非关系的历史基础和丰富内涵

20世纪60年代，正当非洲“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之际，中国顺应历史潮流，发挥绝对优于殖民主义的政治优势，坚决支持非洲国家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非洲国家大量真诚的援助，争取了人心，赢得了信任，凝聚了友谊，奠定了中非友好关系的牢固基础。后来，在非洲国家发展经济、建设国家的努力中，中国那时虽然不具经济优势，但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自己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勒紧自己的裤腰带”向非洲提供了大量的无私的经济援助，帮助非洲国家修建铁路、公路、港口、水坝和许多会议大厦、体育场馆、学校和医院等基础设施，树起一座座中非友谊的丰碑，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对非洲的帮助不附加政治条件，中国坚持平等待人、尊重非洲国家领土主权、不干涉内政、互利合作，诚实守信，同西方殖民方式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的援外专家们与非洲兄弟同甘共苦，无私奉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遍布非洲大陆的中国援非医疗队的白衣使者们不怕苦、不怕脏、不知累，送医送药、救死扶伤，在非洲老百姓中刻下了对中国人的良好印象。长期饱受殖民主义者奴役、摧残和掠夺的非洲人民，对中国人和中国产生了无限感激之情以及无比的崇敬和信任。一大批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如恩克鲁玛、尼雷尔、莫迪博·凯塔、塞古·杜尔、达达赫、恩古瓦比、邦戈、布特弗利卡和努乔马等成了中国的“铁杆朋友”。他们了解中国、理解中国、信任中国和感激中国。在感激中国的同时，他们也努力投桃报李，在中国打破西方遏制、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给中国以有力支持。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到一次次打掉西方人权反华提案，从一再挫败台湾“重返”联合国图谋，到中国在许多国际组织内的竞选，从北京申办奥运会到上海申办世博会，都离不开非洲国家的鼎力支持。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是中非关系一个新的里程碑。中国和非洲国家领导人在北京峰会上确立了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原则，把中非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在中非合作论坛走过的12个年头中，双方根据国际大环境的发展以及各自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和实践中非合作新领域、新内容和新形式，不

不断扩大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显示了中非关系旺盛的生命力，也进一步夯实了中非友好合作的基础。

世界在变化，非洲在前进，中国在发展，中非关系的内涵和形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非洲对中国的重要性没有变，非洲在中国外交格局中的地位没有变。从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构建和谐世界的大任务、大目标来讲，没有非洲的和平和发展，就没有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就中非双边关系来讲，中非互有需求，而中国对非洲的需要则绝不小于非洲对中国的需要。中非关系的领域不是缩小了，而是更宽阔了；内涵不是减少了，而是更丰富了。中国在非洲的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中国在非洲的投入已经得到了丰厚的回报，现在和今后投入的回报率仍会很高。非洲过去是，现在和将来仍然是中国外交斗争的重要战略依托。非洲在涉及中国核心和重大问题上一直给中国以坚定支持，是中国运筹外交全局、应对西方干扰、实现和平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助力。非洲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可依赖的能源、资源供应地和商品、投资的重要市场，也是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支持力量。非洲是中国必要的、相对稳定、比较可靠的贸易伙伴。中非贸易已从 2000 年的 100 亿美元发展到 2011 年的 1 663 亿美元，每年以 30% 以上的速度增长，中国连续 4 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非洲已成了中国第二大原油进口来源地、第二大海外工程承包市场和第四大投资目的地。在非洲开展经贸活动的中国公司已达 2 000 多家。数十万中国人活跃在非洲大陆，谱写中非友谊和合作的新篇章。随着非洲的经济发展和人民购买力的不断提高，中非贸易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

当前，非洲进入谋和平、求稳定、促发展的新阶段，而中国也正值和平发展、经济崛起的新时期，西方大国和新兴国家都更加关注和重视非洲，中国对非工作面临新机遇、新问题和新挑战。我们不能满足于以往的成就，不能吃老本，必须有新思维和新举措，妥善应对新形势，及时解决新问题，不断给中非关系注入新的活力，以务实和开拓的精神，巩固友谊，扩大合作。

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新挑战和新对策

（一）非洲国家领导人更新换代

当今，在非洲领导人中，中国第一代的“铁杆朋友”大多早已作古。第

以政治和经济优势应对中非关系的新形势和新挑战

二、三代的全天候朋友，或已不复存在，或年事已高。对此，我们要有危机和紧迫感。发展国家关系基础在人民，未来在青年，而关键则在领导人。领袖是带头人，是决策人，所以领导人之间的相知和互信至关重要。我们老一辈领导人、外交家毛泽东、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总是深入细致地去做非洲领导人的工作，给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多年来，中国的领导人也在采取不同的形式不断做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近几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已经4次访问非洲，达18个国家。习近平、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等国家领导人都曾造访非洲。非洲国家领导人也频繁访华。2007年至2011年间，就有30位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20位议长来华访问。此外，中非合作论坛是在中国和非洲各国领导人进行经常性的互访之外，集体对话、加强沟通、加深了解、增进互信的重要平台和有效机制。自中非合作论坛成立12年以来，双方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有关部长和高层官员定期进行对话，共同研究、商讨和制定合作大计。

2012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等分别会谈、会见了与会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就中非关系、中国同有关国家双边关系、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了友好充分交流，凝聚共识、提升互信。会议顺利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北京行动计划（2013~2015年）》两个成果文件，为未来三年中非各领域合作绘制了美好蓝图。会议向外界传递出中非坚定不移深化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坚定不移推进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强烈信号，扩大了中非关系的国际影响。

西方领导人往往重利轻义，突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而非洲领导人既重利，也重义，也重感情，在意识形态上并不偏执，在价值观上与中国有许多共同之处。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制定的未来三年行动计划重申，高层互访与对话对促进双边关系发展、深化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继续保持中非领导人互访和对话势头，这是增进政治互信、扩大战略共识的保障。

通过机制化的中非合作论坛这个交流平台，以诚相待、以情感人、锲而不舍，中国和非洲的领导人就一定能做到“长相知，不相疑”，成为好伙伴、好朋友、好兄弟，就一定能增进中非间的战略互信和政治互信，使中非友谊

后继有人，代代相传，从而保证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二）非洲国家政治体制发生重大变化

在经历上世纪 90 年代初西方民主化浪潮的冲击后，目前非洲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多党制。然而，许多国家的多党民主还不够完善，参与多党民主的政党也有待进一步成熟。执政党和反对党在政治纲领和治国理念上没有根本的区别，但往往势不两立。反对党的目的是争取执政权力。因此，他们常常是“为反对而反对”的党，是“绝对的反对党”。他们实行的往往是“凡是政府支持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政府反对的，我们就支持”的政策，往往导致以下后果：一是领导人更换频繁，政策连续性较差；二是治国中存在较为严重的短期行为，政府热衷于搞立竿见影的项目，而不愿搞那些可能会“为他人做嫁衣”的长线项目；三是大选常常影响政局稳定，甚至发生动乱。

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与国关系，进行政府间的交往和合作。反对派在与政府的较量中常常把中国夹在中间，或者干脆拿中国政府同该国政府的合作项目当靶子。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投资和工程承包中不乏有同政府签订的项目遭在野党反对或被后来的政府否定的例子。2010 年，中国铁路工程公司等同刚果（金）签订了一项总值达数十亿美元的资源开发和工程合作框架协议。该项目就遭到刚果（金）反对派的强烈反对。刚果（金）解放运动总书记等指责中国公司“掠夺资源，危害国家利益，将导致刚丧失自由，成为外国势力的保护国”。此外，反对党一旦成为执政党，就会给两国关系带来新的变数。在前些年，在奥巴桑乔任总统期间，中国公司与尼日利亚签订了 80 多亿美元的铁路和 14 亿美元的水电两个大项目。后来尼日利亚通过大选总统易人后，这两个项目就陷入了困境，久拖不决，几度面临夭折的危险。赞比亚原来最大的反对党爱国阵线领袖萨塔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正式当选为总统。萨塔在竞选时就曾扬言，当选后将对中国企业采取严厉措施，甚至威胁要把中国投资者驱逐出境。尽管他上台后对中赞互利合作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态度有所缓和，但中赞经济合作仍会遇到更多的挑战。

在不少非洲国家人治因素和法制因素都相当重要的情况下，中国可采取灵活手段，比如通过政党外交和民间外交等渠道适当做反对派领导人和在野政要的工作，增进了解、联络感情，着眼未来和长远。在合作项目上，可多考虑与当地的传统势力和有实力的公司联手，打造更多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以规避或降低风险，保证可持续发展。

以政治和经济优势应对中非关系的新形势和新挑战

我们还要处理好同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工会的关系。新闻媒体对增进中非人民相互了解、营造中非合作良好舆论氛围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长期以来，非洲的媒体多采用西方新闻通讯稿件，很难让非洲广大人民客观了解真实的中国和中非关系。近年来，在非洲舆论中不时出现质疑和攻击中非合作的杂音。民主化后的非洲媒体不再是政府“听话的孩子”了。一些非洲媒体人受西方新闻观的影响较深，热衷“揭露”和“掘墓”，轻视或忽视新闻在另一个方面的社会的责任，那就是宣扬好的、积极的东西，去鼓励和促进民间的相互了解、相互友善和相互尊重，促进国家和人民和睦相处，进行互利合作，从而造福人民，推动社会的安定和世界的和谐与和平。更有少数媒体为了吸引眼球，为了追逐利润，进行猎奇和炒作，有的还实行双重标准。

我们看到，非洲有一些亲西方的媒体和某些喜欢与本国政府唱反调的媒体，常常拿中国说事，不能客观真实地向当地人民介绍和解读中非合作的情况。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还不强，媒体和舆论工作还比较薄弱，思想不够解放，方法不够灵活，有时还受到语言障碍的制约，投入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也不够大。在这方面，我们与西方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就是同一些发展中大国比较也有距离。西方大国在非洲进行许多年的殖民统治，在思想体系、政治制度、法律法规、文化教育、新闻出版、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仍和非洲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影响是深远的。中国甚至比不上巴西。巴西有9 000万人有非洲血统，在体育、教育和农业合作方面与非洲的联系非常密切。

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的“行动计划”中宣布的新措施为应对这一问题和缩小差距迈开的可喜一步。为加强在新闻与媒体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将在华设立“中非新闻交流中心”，推动双方新闻媒体人员交流互访，支持双方新闻机构互派记者。通过机制化的“中非广播电视台媒体合作论坛”，加强双方在该领域的集体对话与友好合作。加强双方在影视文化领域的合作。中方将积极参加在非洲国家举办的影视节展和在非举办中国影视节目展播，加强双方在图书出版领域的合作，参加在非洲举办的国际书展等。中国在非洲的新闻舆论工作有差距和起步晚，但只要思想重视，措施具体，持之以恒，改变目前的被动局面是大有希望的。

非洲的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且越来越活跃。美国和欧洲总不失时机对他们予以支持和资助，及时施加影响。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还相当滞后。许多非洲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或由于对中国无知、少知，或出于偏见，或出于

对本国政府的不满，时不时无端指责中国，对中非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与非洲工会打交道也是中国公司的新课题。非洲工会多，成员广，比较成熟，独立性较强，是庞大的非政府组织。非洲的工会与中国的工会区别很大，我们用国内的办法去处理同他们的关系肯定是行不通的。他们在法律框架下可以不受政府约束。有的工会甚至能够影响政府的部分决策。在有些国家存在“强工会，弱政府”的现象。近年来，中国在非洲的公司、工厂碰到被工会所出难题困扰的例子已屡见不鲜。在北非“街头革命”的刺激下，非洲的工会更加活跃和有力，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处理好同他们的关系。

（三）非洲国家对中国的期望增大，要求增多

目前，非洲许多国家尚未摆脱贫困，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又被边缘化，因此对老朋友中国期望值较高。过去，中国的经济落后，老百姓生活也比较困难，因此我们常说中国对非援助是穷朋友之间的相互帮助，非洲人能够理解。援助多一些是情，少一点也是义，所谓“艰难愧深情”，他们都很感谢。现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国内生产总值跃升世界第二和持有超过 3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令世界瞩目，让非洲惊叹。许多非洲人认为，他们昔日的中国穷朋友已经变富，而中国的非洲穷兄弟仍然很困难；富起来的朋友理应对穷朋友慷慨解囊。一些非洲人对中国这些年来援非力度已有微词。有的非洲朋友就曾抱怨说，你们把那么多的钱借给富有的美国，帮助经济发达的欧洲，为什么不多借一点给非洲呢？中国对非援助暂时难以达到联合国规定的标准，也不需要同西方大国相比，但同一些“中等收入”国家不能有太大的差距。早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小平同志就曾多次对非洲的领导人说过，等到中国发展了，就会为非洲朋友作更多的贡献。我们高兴地看到，近些年来中国对非援助有较大幅度的增加，2000 年至 2009 年，中国对非援助增长 10 倍。中国免除非洲国家截至 2009 年底政府无息贷款债务 186.6 亿元人民币。2011 年，中国向非洲之角的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索马里提供 4.4 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中国对非投资稳步发展。截至 2012 年 4 月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达 153 亿美元，就是最近十年成果。中国每年对非直接投资从 2001 年的 5 000 万美元提高到近年来的年均逾 10 亿美元。随着中国在非洲利益的扩展，对非的经援贷款和直接投资还需要逐渐增加，幅度也会适当加大。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上宣布，中国将向非洲国家提供 200 亿美元贷款额度，就是中国为推动非洲可持续发展采取的重大举措。

中国也可以利用有较多外汇储备的经济优势加大对非投入。其实，用外汇储备去购买别国的主权债务是有很大风险的，购买信用等级较低的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更大。较好的方法是对外投资。许多非洲国家急需发展资金，而在当前西方国家经济普遍不景气，提供资金有较大困难的情况下，他们渴望中国去投资。我们可以对欧洲有信心，适当援手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更可以雪中送炭，增加对非洲的投资。再说，中国投资非洲和在非洲搞并购遇到的阻力要比在欧洲小得多。只要我们采取谨慎和稳健做法，就可以规避或降低风险。同时，这也有利于中国外汇储备的多元化。“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中国多一份投入，就会多一分回报。

(四) 非洲国家与中国的利益交汇或利益冲突增多

现在中国在非洲是老朋友遇到新问题，老关系面临新挑战。交往多了，合作多了，出现的问题随之多一些，双方的利益交汇和利益冲突增多，这虽然是关系扩展中出现的枝节问题，但其负面影响不可忽视。

随着中非经贸往来日益频繁，非洲普通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正在发生变化，其中有许多积极的变化，但有不少消极的东西。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长期遭受殖民统治而今摆脱殖民枷锁的非洲民众，“自尊心”很强，对“外来人”有复杂心态，他们纯朴但很敏感，热情但也警惕。过去，他们痛恨奴役和掠夺他们的欧洲殖民者，对干涉他们内部事务的西方国家不满。他们比较喜欢中国人。因为中国人真诚地帮助他们，尊重他们，不干涉他们的内政。但由于他们从小接受的是西方教育，舆论又被欧洲媒体主导，西方舆论对中国和中非关系的歪曲、抹黑和挑拨在他们中间潜移默化地产生负面影响。有的非洲人认为，中国人过去给的是无偿援助，是无私的。而今中国人在非洲投入的同时还要获取一定利益，中国人不再那么“无私”了。特别是一旦有少数素质不高的中国公司或个人有不良行为，再被别有用心的人通过现代传播工具加以放大和渲染，就会引起非洲人对中国和中国人产生误解。

中国大批物美价廉的商品输入非洲市场，受到非洲消费者的欢迎。然而，我们的一些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和非洲当地市场与非洲产品形成竞争，给非洲中小企业带来压力。中国商人善于做买卖，有资金优势，有方便的进货渠道，竞争力强，常常与非洲中小商人挤市场、争饭碗，也让他们产生“恐惧感”和不满，甚至怀有某些敌对情绪。一些标有中国制造的假冒伪劣产品被不法商人输入非洲市场，败坏了中国商品的声誉。双边贸易中和非资源性国

家贸易失衡、中资企业本土化程度不高、与当地融入不够。走进非洲的中国企业有 2 000 多家，也有不少个体经营者，参差不齐，鱼龙混杂。有少数企业急功近利，土法上马，安全措施不到位；不了解当地法律，忽视当地风俗习惯，罔顾民众感情；违法违规经营，把国内的一些不正之风带到国外，金钱开道、贿赂官员，破财消灾。害人害己，也给中国企业和国家形象抹黑。还有少数中国人办的工厂不注意环保和安全生产，造成非洲工人重大伤亡事故，影响极坏。另外，有些中国公司搞恶性竞争和自相残杀，自毁市场，自毁形象。中国企业一定要克服急功近利，实现发展速度与质量、效益的统一，才能有前途。

在对非投资方面，我们要进行理念的转变、方式的更新、结构的调整。中国应努力推动对非经济合作方式的转型升级和结构的调整。积极推动将国内制造业过剩产能有序地向非洲转移，帮助非洲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我们要特别注意，转移到非洲的国内过剩产能企业绝不是“夕阳企业”，更不是被淘汰的企业，而是有较高科技含量、节能环保的企业。中国可以按照非洲当前的环境和需要，按照中医“辨证论治”的理念，增加非洲发展的“造血功能”，同时为非洲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以按照非洲当前的需要，建立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变初级产品为中高端产品，提高附加值；形式上可以多建立合资合作企业。非洲当前的发展阶段有些类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需要引进外国的产品、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那个时候所想的，所需要的和对外国企业所要求的，有许多就是他们今天所想、所需和所求的。我们应该想他们所想，急他们所急。

近年和今后若干年，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十分旺盛。非洲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桥梁、铁路、港口、电站和通讯，以及市政设施、民用建筑、体育场馆等公共设施，其落后状况是长期制约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困难之一。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资金不足，二是技术缺乏，三是人才匮乏。近年来，非洲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正在成为世界新的投资热点，这也是中国企业家应该抓住的好机会。

在贸易方面，应该增加在地区和当地市场的批发业务，减少零售，为当地提供稳定货源。由贸易转向生产，促进当地就业，增加利润空间。应该努力消除非法的中国小商贩在非洲“打游击”摆地摊和非洲小商贩争抢饭碗的现象。

以政治和经济优势应对中非关系的新形势和新挑战

中国政府对中国企业在非洲出现的问题应高度重视，绝不能“护短”。中国政府要明确政策和措施，切实重视经贸合作中出现的问题。从体制、机制、源头上加以解决：成立权威协调和管理机构，严肃认真地调查、梳理出现的问题，制定带有可操作性的奖惩措施的中国在非洲企业行为规范，规范企业在非投资和经营行为，防止行贿、欺诈和不道德行径；要求中国在非洲的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要有长远的发展意识，注意规范操作、合法经营，保证产品和工程质量；要注意到非洲是弱势群体和贫困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我们在交往中应该多尊重他们，多照顾他们的实际利益，多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特别是要增强回馈社会的意识，企业在获利的同时要积极从事公益事业，回报当地人民。我们还要多加强文化交流、多进行感情沟通，要在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相互借鉴。

中国必须重视对非洲的人才培养。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实施“非洲人才计划”，在今后三年为非洲培训各类人才3万名，提供政府奖学金名额18 000个，将为非洲援助职业技术培训设施，为非洲国家培训职业技术人才，尤其帮助非洲青年和妇女提高职业技能，与非洲国家进行科技合作，推动先进适用技术转让，实现知识共享，提高非洲国家科技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

中国要在合作中切实照顾非洲方面的关切，加大对非洲投资、技术转让、制造业、初级产品加工等领域的合作，培育金融、保险、物流、航空等新的合作增长点。帮助非洲国家建设交通、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把企业发展和所在国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联系在一起。

(五) 中非合作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

欧洲人之所以对中非关系越来越在意，越来越敏感和恐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政治，二是经济。他们担心“中国模式”在非洲的影响会对西方推行其民主价值观和欧洲模式形成冲击。他们还认为，中国从非洲获得的经济利益多了，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甚至不喜欢我们跟他们讲中国和欧洲可以在非洲实现合作共赢，因为“共赢”意味着本来被他们垄断独享的利益被中国分享了。美国和欧洲又阻挡不了中非经贸关系的发展，就找茬对中国批评、指责，甚至明里、暗里进行破坏。

一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和媒体不时对中非合作说三道四，常常渲染和放大中非合作中的瑕疵，抹黑中国在非形象，破坏中非关系。英国首相卡梅伦、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在访非期间就曾公开攻击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专制资本主

义”。有的西方政客和媒体甚至给中国扣上“新殖民主义”的帽子，干扰中非能源资源合作。西方的宣传潜移默化地渗透到非洲民意之中，使所谓的“中国新殖民主义论”、“中国威胁论”在非洲有了一定市场。2011 年年初，英国广播公司（BBC）在非洲播放《中国人来了》的纪录片，妄图抹黑中国形象。与此同时，美国等也将遏制中非关系作为其在全球范围内遏制中国的重要环节，他们一方面加大援非和对非合作力度，另一方面加强对非洲国家的控制。一些非洲国家迫于压力，在开展与中国合作时顾虑增多。美欧提出与中国在非洲开展三方合作，不排除有试图“规范”我们的行为，约束中国在非活动的企图，但也有不得已而顺应形势的积极应对之举。2010 年 8 月，在法国举行的“非洲－中国关系”讨论会上，法国外贸国务秘书伊德拉克曾表示，欧洲的技术、中国的资本和效率以及非洲年轻的劳动力可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也说，欧、中可以探讨摒弃完全的利他或利己主义，以务实的态度，建立三方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和长期战略。

中国和西方在非洲的矛盾和竞争是长期的，但中国积极发展对非关系是持开放态度的。中国欢迎欧美增加对非洲的援助和扩大同非洲的合作，愿意同一些有意与我合作的国家在非洲建立三方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非洲拥有更多财源和更多的合作伙伴，对非洲有好处，对世界也有好处。中国可与他们进行不同规模和层次的沟通和磋商，认真探索，增信释疑，尽量减少西方对中非关系的疑虑和干扰。中国可以按照“非方参与、互利共赢、平等相待、优势互补”的原则，尝试在农业、卫生等次敏感领域开展小规模合作，选择适当地区和合适项目搞一些三方合作的试验田。中国不要害怕别人“规范”我们，只要中国的做法是规范的，就不在乎别人的“规范”。

（六）中非合作中的国内消极因素增长

中国人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好传统。中国的老百姓现在更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在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显著，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上升和全球信息化发展的今天，中国老百姓有着参与国家外交和关心世界政治的强烈愿望和高涨热情。这是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宝贵资源和重要力量。

然而，我们民众中的许多人，特别是少部分年轻人，对国家的总体外交战略、政策和策略了解不深，理解不够，看问题也缺乏全局观念和国际视野。笔者长期从事对非洲工作的，对此亦有许多体会。经常有人对我说，你们为

以政治和经济优势应对中非关系的新形势和新挑战

什么要去交那么多非洲穷朋友，不是给国家添包袱吗？最近还有不少人说，我们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内有那么多贫穷的地方，还有那么多人还没有脱贫，不应该拿出那么多钱去援助非洲。就连向马其顿这样的小国赠送几辆校车，也遭到一些网民的指责。持以上看法的人至少是对中国外交政策中的“援外”不了解和曲解。我们应该开展一些全民性的学习、讨论和教育活动，提高公众对中国外交政策中对外援助和合作意义的理解与认识。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在这方面加大宣传和引导公共外交的力度。

关于中国对非洲援助，中国政府有必要向公众讲清以下道理：第一，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援助非洲是自己的国际责任、国际义务和国际公德，是中国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自己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非洲大量的真诚的援助。支持非洲国家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现在的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尽管我们还处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但和上世纪不可同日而语。而我们的非洲兄弟，仍有较大的困难，我们对非洲的援助有所加大，应该是情理中的事。再说，绝不是只有富人，或者只有富到某一程度，才能帮助他人，才能行善举、义举。第二，中国援助非洲也是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的。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中国需要非洲。我们对非洲的援助实际上已经得到丰厚的回报。第三，援助是相互的。第四，中国对非洲援助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和西方国家对非援助在数量上还有很大的差距。

我们必须引导中国的广大民众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看到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只有民众的了解、理解和参与，中国的公共外交、整体外交才能搞得更顺畅、更有声色、更有成就。

充实和增加中非关系的政治内涵

现在中国发展了，比以前强大了，在国际舞台的分量也增加了，非洲在政治上对中国倚重也在上升。非洲真心希望中国成为平衡世界力量的重要因素，希望在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方面中国能发挥更大作用。非洲更期待中国在维护非洲和平稳定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中国也正可以发挥优势，顺势而为。

1. 中国应在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大原则下，关注、关心和帮助非洲国家致

力于和平和稳定的能力。

中国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解决非洲热点问题的参与和斡旋力度，以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方式穿针引线，缩小分歧，化解矛盾，劝和解，促谈判，用中立、客观、公正的态度去影响形势发展，同时又可以扩展自身利益，凸显中方的政治作用和地位。

2. 中国应充分发挥在国际舞台上和国际体制内的影响力。

一是要关注和照顾非洲的核心利益。在非洲国家需要我支持、需要中方说话时，要敢于坚持原则、仗义执言。那样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但能增加中国在广大非洲国家中的分量。如果中方在该说时不说，会伤“非洲国家的情，冷非洲人民的心”。

二是要明确支持非洲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会成员的合理诉求。这是一个棘手的然而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挑战，但也是机遇。笔者的建议是，中国可选择适当时机，主动牵头在联合国提一个单独支持非洲国家入常的提案，明确宣示中国支持非洲的坚定立场。中国支持非洲国家入常，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支持非洲入常是中国主动发挥政治优势的良机。今天，非洲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了经济建设，迫切希望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争取更多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实惠。非洲国家看重我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地位，希望中国在涉及非洲重大利益的问题上能给予有力支持。非洲当前的最大诉求是入常。中国应该抓住机遇，主动发挥我政治优势。

其二，近年来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问题上，中国与非洲国家密切协商和配合，有力地维护安理会改革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由于某些西方国家的恶意挑拨，也曾引起过一些非洲朋友误会。中国有必要主动提出支持非洲入常以消除误会。当然这个提案会遇到较大的阻力，但可以让非洲国家清晰感受中国仍是他们的“真正朋友”。

其三，现在正是“投桃报李”的机会。长期以来，非洲国家在不同国际场合均给予中国有力支持，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今天，非洲国家要求入常，作为讲原则、重友谊的大国，中国不能不做出积极有力的回应。在非洲需要我们的时候，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中国顺其意、遂其愿，其政治影响将不亚于 20 世纪 60 年代我们支持非洲的独立和解放运动。

联合国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宜先易后难。国家数目最多的非洲

以政治和经济优势应对中非关系的新形势和新挑战

大陆在安理会没有代表权，是最不合理问题之一。中国提出先解决这个问题是无可厚非的。

在非洲入常的问题上，中国不能被逼着走、推着走，完全可以发挥积极性、主动性，显示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特色，抓住这个机会，为中非长远友好夯实政治基础。

3. 中国应在帮助非洲探索发展道路中有所作为。

由于中国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国外和国内有不少人在谈论“中国模式”。外国人大谈中国模式，不外乎有两种目的。一种是认为中国的治国和发展方式值得借鉴，另一种是怕中国模式冲击西方模式，宣扬“中国威胁论”。在中国也有两类人在谈中国模式：一种是要说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对世界的普遍适用性，另一种则极力否认有中国模式，说“只有中国道路，没有中国模式”。那是担心讲中国模式会让别人害怕。其实，中国模式就是中国治国之道，是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方式和方法，是中国政府和人民进行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做法。这些方法适合中国的国情，但也不反对别国借鉴，因为其中本来就有不少是从他国学来的。任何国家的发展经验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经验和成果，不能强加给别国，也不能保守。我们不要去宣传什么“中国模式”，但不反对别人研究和借鉴中国的一些成功经验。

过去，非洲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学过西方，在经济发展方面也采用过西方的“药方”，都不灵验。当然，在上个世纪的一段时期内也有一些非洲国家机械地照搬过“中国式社会主义”或“苏联式社会主义”，都走了弯路。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和分析西方当前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非洲国家领导人不断进行反思。现在他们十分羡慕中国快速发展的经验和制度模式，希望借鉴中国经验，期待切实利用中国发展的机遇。2012年年初，已故埃塞俄比亚总统梅莱斯曾在非盟新总部落成典礼上说，20世纪晚期西方给非洲开处方是“害人的庸医”，认为近期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之所以能快速增长与选择中国的“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有关。加纳外交部长穆穆尼表示，“西方金融危机后的拙劣表现坚定了非洲向中国靠拢的意志”。据南非《邮卫报》透露，南非总统祖马即将颁布的新经济改革政策也将效仿“中国模式”，包括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强化国家和国企对国民经济的导向性作用。

中国和非洲有相似的历史，又面临相同的任务。中国发展经验在非洲的

确有可以借鉴之处。他们想学，我们应该积极热心地给以帮助和指导。非洲的领导人都十分推崇中国的一句老话“授人予鱼，不如授人予渔”。他们希望中国人不仅尊重非洲人自己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而且要主动和大胆地帮助非洲寻找发展道路。不要因西方宣扬“中国模式威胁论”，我们就不敢理直气壮地去帮助非洲。西方极力向非洲输出他们那些对非洲根本不合适的模式，那是祸害非洲，我们是诚心诚意地帮助非洲，不但不需谨小慎微，更应理直气壮。帮助非洲国家积极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是“国际主义”在新时代的体现，是中国的国际责任。另外，不干涉内政、不输出价值观和真诚地向别人提出参考意见和建议是两码事，不应混为一谈。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发表的北京宣言强调，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政治磋商和战略对话，密切高层往来，加大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尊重和支持彼此在主权、独立、安全、统一、领土完整、国家发展等方面的核心利益，增进中非之间的政治互信和战略共识。这就是我们在发展中非关系中的新思维。

结 论

中国发展对非关系需要新思维和新对策，其核心和基础是正确认识非洲对中国的重要性，把重视对非关系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决不能停留在口头外交上。中国的外交政策一定要有更多的前瞻性，不能被动应对。我们不应当对中非关系的“免疫力”过于自信，对非工作也要防患于未然。由老一辈革命家、外交家呕心沥血打造，又经过 50 多年精心培育、维护和发展的中非友好合作关系弥足珍贵。对当前有损于中非关系的新苗头、新问题绝不能掉以轻心，中国政府部门有权威、有能力、也有手段加以解决。

当前，中非关系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北非动荡发生之后，非洲国家正在对动荡的根源进行反思。“茉莉花革命”浪潮虽然不大可能席卷整个非洲大陆，但不少国家仍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广大非洲国家在采取一些扩大民主、和缓矛盾应急措施的同时，迫切需要发展经济、减少贫困、改善民生。西方大国在中东的所作所为，让非洲国家领导心存恐惧。他们“向东看”的倾向较为明显，对中国倚重、同中国合作的愿望将更加强烈和更加迫切，中国应抓住机会，努力开拓，创造中非关系的新领域、新亮点、新成就，把中非关系推向更高的水平。

Responding to the New Situation and New Challenges in Sino – African Relations wit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dvantages

Cheng Tao

Abstract: Last century, China sincerely gave aid to Africa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strongly supported Africa's struggle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laid solid foundation for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Today, although the connotation and forms of Sino – African relations have changed greatly, the mutual need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and the importance of Africa to China remain the same. At present, faced with new opportunities, new problems and new challenges, China needs new thinking and new initiatives in its work in Africa. To be well acquainted with each other and free from suspicions, the leaders of China and Africa must properly respond to challenges poised by democratization and multi – party system in Africa, and well treate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media, non –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rade unions. With the intersection of interests or conflicts of interest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n countries increases, we, as far as the areas of assistance, investment and trade are concerned, shall change the concept, update the method and adjust the structure, actively resolve the negative domestic factors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seriously respond to negative factors of western powers in Sino – African relations, further develop China's political advantages, enrich and increase the political connotation of Sino – African relations, strive to build the new areas and new highlights in China's diplomatic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Key Words: Sino – African Relations; Forum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New Situation; New Problems; New Thinking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